

# 路易斯·格丽克诗歌在中国的翻译传播研究

窦思佳

同济大学

**摘要：**作为囊括翻译学和传播学的新型交叉学科，翻译传播学有助于分析异语场景下的传播效果问题。本文基于翻译传播学六要素，探析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现当代女诗人露易丝·格丽克诗歌在中国的翻译传播，解读格丽克诗歌在中国传播效果所涉原因。本文认为，格丽克作品在中国并未得到广泛传播，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与其本人、译者、诗歌内容、传播媒介和受众都有一定关联性。

**关键词：**格丽克诗歌；翻译传播学；在华传播；传播效果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3.02.086

## 一、引言

美国女诗人露易丝·格丽克“因为她那无可辩驳的诗意般的声音，用朴素的美使个人的存在变得普遍”<sup>[16]</sup>于2020年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即便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美誉，也未能使得格丽克之浪潮在中国文界延绵，这背后原因值得深究。

格丽克的诗歌创作生涯，以处女作诗集《头生子》（Firstborn, 1968）的出版为标识，起步于自白诗风蔚然一时的20世纪60年代末，受到稍早时期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与安妮·塞克斯顿（Anne Sexton）等人影响。格丽克迄今出版12本诗集单行本，其诗歌创作常围绕家庭生活和亲密关系展开，有诗歌随笔集《证据与理论》，曾获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2003年被评选为美国桂冠诗人。

在格丽克文学研究层面，2010年以前主要研究成果来自柳向阳，2014年起，万丽君对格丽克文学性研究有所涉猎；2015至2017年，仅有零散的几篇文章对格丽克进行探讨；在格丽克摘得诺奖后，学术界出现短暂研究热潮，但大多停留在其文学性层面，未系统性地涉及格丽克汉译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影响及背后因素。

## 二、格丽克诗歌在华汉译传播历程

格丽克诗歌首次被译介至中国以来的最近20年，柳向阳、彭予、范静哗、周瓛、舒丹丹、毛凌滢和殷晓芳等在内的诸多译者都对其作品进行过翻译。目前，学界关于格丽克首次译介到中国的时间尚不明晰，学者熊辉（2021）认为早在1989年彭予翻译的《在疯狂的边缘：美国新诗选》其中编入了格丽克的四首短诗，标志着其诗歌在中国大陆的“诞生”；21世纪初年，格丽克诗歌开始被翻译发表在中国的诗歌刊物上<sup>[1]</sup>。《世界文学》曾于2011年第5期的“美国桂冠诗人”小辑中首次译介格丽克的六首诗歌（彭予译），后于2014年第

4期刊登柳向阳翻译的格丽克诗作以及译者的评论文章《露易丝·格丽克的疼痛之诗》；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了她的作品精选集《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柳向阳、范静哗译）和《月光的合金》（柳向阳译）。虽格丽克诗歌汉译历程已久，但传播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为分析其中原因，需基于专业翻译传播理论对其加以解读。

## 三、格丽克诗歌在华传播效果及原因

### （一）格丽克本人于其诗歌在华传播的影响

格丽克诗歌在中国并未受到高度关注。最早脱离格丽克诗歌汉译本身而进入其文学性研究的论文由柳向阳于2008年发表，题为《路易斯·格丽克诗歌创作简评》，2010年，柳向阳同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合作《关于黑暗世界的艺术——评路易斯·格丽克诗集〈阿弗尔诺〉》，2020年以前共发表43篇可见，在格丽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中国学界对其研究寥寥无几，2020年至今，格丽克相关论文发表量为75篇，虽较此前有明显进步，但绝对数量仍然偏小；格丽克在中国的译者柳向阳曾在文章中回忆，其译介格丽克诗作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从2006年开始翻译格丽克诗歌到2015年格丽克第一本诗集出版的十余年间，柳向阳将大多业余时间都用于翻译她和杰克·吉尔伯特的作品，翻译杰克·吉尔伯特从2008年开始，尽管寻找出版的过程中屡遭挫折，《诗全集》交稿四年后才得以出版，但“没想到一出版就火爆，到2020年8月出版合同到期前已加印两次”。“而格丽克这边呢，2016年4月出版，到2019年1月才加印一次。”<sup>[17]</sup>由此可见格丽克在获得诺奖前，本身在中国的流传度相对较低。

### （二）译者柳向阳

翻译传播学在译者研究领域强调“译者主体性”，“主体性是指‘在与客体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人的自

觉、自主、能动和创造的特性’”<sup>[14]</sup>。通过对柳向阳这一格丽克诗歌汉译“牵头人”的主体性控制分析或许能给学术界一些启示。

译者自主性主要指“译者对文本的对象性把握”，包括如何翻译、为何翻译等本体性问题。格丽克的“忠实”译者柳向阳生平朴素，是从河南上蔡农村走出的一位国际贸易专业的央企职工，翻译并非其主业。格丽克诗歌诸多意象来自古希腊。关于如何将这些文化意味深厚的诗歌翻译成中文这一问题，柳向阳表示就是“直译”，原汁原味地还原诗歌本来的样子。

译者选择性主要表现在译者选材倾向、翻译标准与原则及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之中，也就是说，译者柳向阳对于原文是具有“主动控制”能力的，具有“主体性”，即“译者参与讯息传递的内容筛选”<sup>[13]</sup>；译者的主体性又可分为译前协商、译中控制和译后协调三个时间段，译中控制中就包括向作者请教这一环节。在柳向阳翻译格丽克诗歌的过程中，一直会同作者本人进行沟通联系，因此，柳向阳对于格丽克诗歌翻译的“主动控制”归根结底还是受到了格丽克本人的较大影响的；如前文所言，格丽克拒绝为诗集作序、拒绝诗歌单篇或节选出版等要求。

### （三）格丽克诗歌原文及汉译作品

格丽克诗歌的思想内容也是影响其作品传播的关键。除了前文所提及的其诗歌大多涉及古希腊神话、圣经等典故外，格丽克对死亡主题的偏爱是其又一大特色。格丽克如此偏爱死亡主题的一个原因是受其家庭环境的影响。在格丽克出生的前七天，其姐姐不幸夭亡，整个家庭随之陷入悲痛之中。新生命的降临，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太多的喜悦，更多的是“睹人思人”。这种与生俱来的哀伤感深深烙在了格丽克的内心深处。因此，在她之后的诗歌创作生涯中，她用大量的文笔描写死亡和新生，其诗中充满着孤独与悲痛的气息。格丽克似乎从一出生就面临死亡，她对死亡的态度不是惧怕，因为在她心中生存比死亡更使人恐惧。她的名诗《野鸢尾》开头就说：“在我苦难的尽头，有一扇门。听我说：你称之死亡。我记得”。家庭因素对于格丽克诗歌中的死亡主题影响重大，忧郁的家庭环境使她无法脱离死亡这一主题。当读者读到她的诗歌时，就可以感受到诗中体现的哀伤、悲观、叛逆、孤独……格丽克偏爱死亡主题的另一个原因是她受到了其他文学家的影响。格丽克对诗歌尤为喜爱，从小就开始阅读莎士比亚、布

莱克、济慈、艾略特等文学家的作品，其中她尤其偏爱艾略特。1993年，格丽克在美国诗歌评论中发表一篇题为《瓦解、犹决、不语》的文章，其中就表示艾略特的“诗歌的中心是‘言下之意’”<sup>[1]</sup>，而在该篇文章中，格丽克所论证的中心思想便是“言下之意”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其对艾略特诗歌的欣赏。艾略特对格丽克的影响，在《新生》中有所体现，格丽克的《新生》与艾略特的《荒原》有不谋而合之处。从这一诗节可以看出，诗人开始时满怀希望，而后是失望过后的哀叹。格丽克通过自然的描绘方式使死亡悄无声息地与生命中的美好融入一起，从而说明死亡是无法避免的。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采访中，格丽克也曾表示自己的作品是没有“叙事”和“行为动作”的<sup>[3]</sup>，这于其追求“言下之意”的创作思想一脉相承。此外，格丽克诗歌主题及风格的形成与美国诗人艾米丽·狄金森也密不可分，在获奖演说中，格丽克也提及在其年少时期广泛阅读狄金森的经历<sup>[2]</sup>。

### （四）传播媒介单一

翻译传播学认为翻译传播媒介包括开展翻译传播活动的报社、期刊杂志社、图书出版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电影公司和网络等。<sup>[14]</sup>翻译传播效果也受到传播媒介的影响，媒介分为媒介技术和媒介组织<sup>[12]</sup>，就格丽克诗歌汉译在中国的传播而言，这二者都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自1989年格丽克的诗歌被译介至中国以来，其作品多以图书出版的形式即纸质形式出现，1989年至2021年间，格丽克的诗歌由以柳向阳为代表的一众译者译入中国，且都断断续续地发表在纸质刊物或书籍上；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站是运用最为广泛的网络翻译传播媒介<sup>[14]</sup>，这一时间恰巧同格丽克最早译介至中国的时间吻合，未能在网站广泛运用的时期借助这一媒介对格丽克的诗歌进行宣传实为缺憾。

格丽克诗歌在中国翻译和接受的冷清现状自然亦与出版社有关。格丽克固然荣誉等身，先后获得了普利策诗歌奖和美国桂冠诗人等显赫的“头衔”，但中国读者对她的了解实在太少，国内翻译界对她作品感兴趣的译者寥寥无几，而且其作品的翻译发表也可谓姗姗来迟。正因如此要出版格丽克的诗歌翻译集就面临着困难境地：鉴于格丽克在中国的读者偏少，在市场运营模式下，出版她的作品很难获得回报，经济上存在亏损可能性，很多出版社对之望而却步。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

格丽克的诗歌翻译合集直到2016年才出版，与诗人出版第一部诗集的时间相隔将近半个世纪。

#### （五）翻译传播受体—中国读者

从传播行为来看，翻译传播受体与前文所提及的翻译传播主体相对。根据翻译传播学理论，传播受众的先验观念对传播效果会产生一定影响先验。在格丽克获得诺奖之前，除格丽克的译者和少部分学界人士以外，普罗大众对其鲜有了解，这难免给中国读者带来距离和陌生感。而在了解格丽克或是读过格丽克的中国读者眼中，如上文中提出，格丽克主要以下几种形象存在，而上述形象的出现与前文所提及的格丽克本人的个性、其诗歌本身的主题、译者译文的选择等因素又密不可分，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读者和格丽克诗歌的联系就越来越疏远。越是符合中国人审美和情感表达诉求的作品越是会受到读者的追捧，反之则会与读者疏离。

以上翻译传播过程的五要素对于格丽克诗歌在华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而翻译传播过程中的第六个要素，即传播效果，则是检验传播活动是否成功的最终标准。在翻译传播效果如何充分实现这一问题上，尹飞舟、余承法、邓颖玲则提出应当注意翻译传播各要素间的充分互动，克服包括语言、文化、情感、制度在内的传播障碍以及形象构建这三大方面。

#### 四、结语

这段文章提到了翻译传播学中的六个要素，即格丽克本人背景、以柳向阳为代表的中国译者群、格丽克诗歌特点、传播媒介影响和中国读者接受。作者指出，格丽克诗歌在中国的传播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交叉融合造成的。通过翻译传播理论的切入点，可以优化其诗歌在华传播，聚焦翻译传播所涉及的各要素影响和三大因素。在当今后疫情时代，中外文化交流变得更加复杂。为了坚守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道路，在中国故事的外译传播过程中，应充分利用翻译传播五个要素的互动，发挥翻译主体的作用，并与翻译主体进行及时沟通，确定和改变内容形式。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也应充分利用这一媒介对传播效果的助推作用，并考虑受众的阅读偏好。同时，还需要克服传播障碍并构建形象，以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

#### 参考文献

[1]Glück, Louise. Disruption, Hesitation, Silence[J]. The American Poetry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1993, vol.22, No.5, pp.30—32

[2]Douglass, Ann. Descending Figure: An Interview with Louise Glück[J]. Columbia: A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Art, Spring/Summer 1981, No.6, pp.116—125

[3]Glück, Louise. A Sharply Worded Silence[J]. The Threepenny Review, SPRING 2014, No.137 (SPRING 2014), p.24

[4]<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21/aug/31/louise-gluck-poems-1962-2020-review-a-grand-introduction-to-the-nobel-prize-winner>

[5]张乐.波德莱尔与格丽克诗歌中死亡主题的差异性[J].外国文学, 2021.05, 74—76.

[6]熊辉.露易丝·格丽克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J].当代作家评论, 2021 (3)

[7]韩浩月.格丽克的热度为何下降得这么快? [J].中国青年报, 2020 (10)

[8]唐中华.给困顿中的诗歌一抹亮色—美国女诗人露易丝·格丽克[J].世界文化, 2021

[9]胡铁生.格丽克诗学的生命哲学美学价值论[J].学习与探索, 2021 (1)

[10]曾巍.珀涅罗珀的织物—格丽克《草场》对荷马史诗《奥德赛》的改写[J].外国文学研究, 2021, 43 (01)

[11]包慧怡.格丽克诗歌中的多声部“花园”叙事[J].外国文学研究, 2021, 43 (01)

[12]邓颖琳、李颖.翻译传播效果动因解析[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4 (6)

[13]尹飞舟、余承法.翻译传播学论纲[J].湘潭大学学报, 2020, 44 (5)

[14]尹飞舟、余承法、邓颖琳.翻译传播学十讲[M].湖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15][美]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M].何道宽, 译.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5: 35

[16]Nobelprize.org,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20: Louise Glück,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literature/2020/summary/>.

[17]柳向阳.露易丝·格丽克诗歌译记[J].诗歌月刊

[18]张乐.波德莱尔与格丽克诗歌中死亡主题的差异性[J].文学教育, 2021, (05)

[19]露易丝·格丽克:《月光的合金》[M], 柳向阳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